

尊重历史才是好的历史小说

□李乃庆

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外都有,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写什么,怎么写,每个作者都会有自己的视角和表现手法。

出于对历史小说创作的爱好,本人目前已有三部历史小说出版,其中《秦楚情仇》(上下卷)《汲黯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符氏三皇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作品是否能受到读者的欢迎,由读者去评判,但作为作者,对作品的出版还是感到十分欣喜。欣喜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作品的出版,而是在于出版社对书稿的高质量要求,编辑们丰富的知识和对作品一字一句的严格把关,使我对如何写好历史小说有了新的认知,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得到了提高,所以,忍不住写写历史小说创作中的一些感受。

写小说是我的业余爱好,自1981年发表处女作后,虽然不断有作品散见于文学刊物,但都是现实题材。因为是业余爱好,所以,在1997年到2007年做博物馆馆长期间,便从文学转向了文博和历史文化研究,十多年没有涉足小说创作。直到做了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着手编修《淮阳县志》,环境清静了很多,才又“重操旧业”,写起小说来。但依然是现实题材小说,如上访题材长篇小说《无路之路》,从修志角度写官场的《史官》,写文物保护的《博物馆馆长》等。出于对文学的喜爱,曾经也读过不少历史小说,但没有就历史与历史小说进行过思考,后来随着对历史的研究,感到不少历史小说不乏“演义”之作,甚至出现不少乱穿越现象。本人认为,既然标明是历史小说,就要在写出“历史真实”的同时,又有作品的艺术质量,无愧于读者,才是好的历史小说。

淮阳地处中原,是三皇故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物产丰盈,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发生在淮阳的重大历史事件,出现的杰出人物,不胜枚举。很早就想写写历史题材,但一直不敢动笔,一是惧怕笔力有限,二是认为没有丰富独到的考古资料,写不出史籍以外的东西,没必要再写,要写就写史料不清,又有考古发现,能写出更真实的历史和人物,这样的小说才有价值。所以,一直没有动笔。

走向写历史小说,得益于我做过10年博物馆馆长和5年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编修《淮阳县志》。2011年4月,在完成《淮阳县志》评审稿,准备对志书进行省级评审的时候,我得到一个震惊的消息:中央电视台播发了专题片《复活的军团》,其中第五集《举国之战》讲到公元前224年——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时在楚国旧都城(今淮阳县)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战争。尤其是讲到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一块木牍,是参加这次战役的叫黑夫和惊的弟兄俩的家书,并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士兵家书。家书中讲到“直佐淮阳,攻反城久”。淮阳曾经是楚国都城,有很多秦楚之间的故事。但是,史书记载的都是孤立的事件,都是历史的碎片。这件文物的发现,引发了我创作历史小说的兴趣和灵感。为了验证它的“真实性”,亲赴湖北云梦实地考察,亲见文物。

当溪流融化了复苏的大地上最初的那片冰雪,自由地奔涌欢唱时,春天带着生机勃勃的希望,来到每一个有着美好向往的生命面前,它送来一个美好的消息——

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集《自由与向往》,这是我从自己数十年创作的上千篇散文随笔作品中精心挑选的一本作品。

这本散文集,有的篇章短至寥寥数十句,有的则洋洋洒洒三两万字,在静美如水的岁月中,散放着空谷幽兰般的诗意,它的灵动如花的智慧和体现的热爱生活的昂扬精神,让阅读它的人们深感有一种穿透灵魂般的力量,又充满喜悦,给人以极大的心灵启迪,以及禅悦般的灵魂慰藉。当然,这也让阅读它的人几乎触碰到它们温暖的灵魂的羽绒,感受到释怀。满满的正能量和俯首可拾的哲言警句、精巧优美的描写细节,不得不让人感怀——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原来文章可以如此宁静而致远,庄严而美好,对生活的感触可以是这般的深刻真切而细腻。

我可以诚实地说,这是一本值得用心品读的书籍,正如书中所说:“只要你给它一枝春意,它还让你盎然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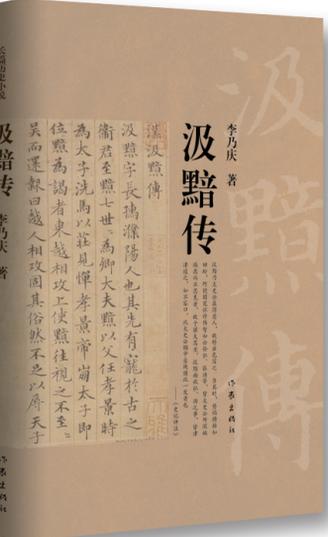
我也认为我已将独特的人生经验与禅者智慧、生活体悟,以及自然人生酿于一坛,熔炼一炉,体现出不一样的美学和文学价值,与对生命和生活的尊重和热爱。

书中所选的篇章字里行间折射着人性温暖的光辉,尤其对生活满怀的真挚热忱,我对人生与生命透彻的更深层次的追寻探究,对生命价值的形而上的思考,润物无声地潜入所思、所见的日常细微。相信读完这部书,让人对岁月与人生,生命与生活,环境与心灵,都会引发值得珍视的启迪。

完成这一切,又结合我们当地的诸多考古发现和史籍,做好功课,列好提纲,便准备创作《秦楚情仇》,书写战国时期这段乱世历史。可是,当进入写作状态时,却一脸的茫然,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平时写现实题材小说,以自己的风格即可,现在一举起笔,却迟迟难以落下:太文雅了,读者不好接受;按现实小说的语言又没有古味。如我、吾、你、汝的运用,之、乎、者、也的运用,很难把握如何运用更合适。阅读司马迁的《史记》,“我、吾、你、汝”,在不同的文章中也不尽相同。仅开头的1000字居然折腾了半年,迟迟找不到感觉,把握不准。所以,只得采用叙述语言古今结合,人物对话力求古味。小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征求读者的意见,回答也不尽相同。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时,重新修订,受益匪浅。《汲黯传》虽然写的是西汉的历史,除上述问题外,还遇到了新的问题,如年代问题,叙述中如果仅按历史的纪年法,读者一时难以分清公元的哪一年,如果在下面注释,有点像学术著作,通过反复探讨,接受责编的意见,采取在括号中注明的办法,这样让读者一目了然。

同时我认为,写历史事件和人物,必须站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对事件和人物进行考量,而不能以今天的视角和思维去衡量。对于政治人物,要站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时代格局的高度去评判,而不能以个人的喜好和标准去“孤立”地评价。否则,就会“非历史”。如《秦楚情仇》关于秦始皇形象的塑造:秦始皇的形象2000多年来“暴君”“焚书坑儒”等已成“定论”,写作中通过考古资料和各种史料分析,断定这是“冤案”: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天下纷纭,不用武力,能统一天下?如果以一些“学者”的“就事论事”的观点,不站在政治的高度,怎么能正确评价帝王?战国时百家争鸣,天下统一了,治国时难道还要阴阳家、墨家、法家、道家、纵横家,百家争鸣?还要使用纵横之术合纵连横,相互攻伐?且秦始皇焚的书多是那些“术士”欺骗他的“术书”,真正的各国史籍都藏在图书馆,倒是项羽带兵进入咸阳城后把整个城,包括图书馆都烧了。所以,写作中坚持以考古为准,还原真实的秦始皇,没有把他写成暴君。类似这样的东西很多。总之,历史小说虽然不是“史”,但要通过艺术的形式还原历史,再现“真实”,不能随便演义,所以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研究历史者可有史,喜欢文学者可作文。为此,不知在写作中承受了多少“苦”。

《符氏三皇后》写的是赵匡胤兵变前后的那段历史,即五代及北宋的历史,写的也是乱世。很多史实,1000多年来一直是谜,如赵匡胤兵变后为何不“大开杀戒”?他是怎么死的?宋史都是宋朝人写的,很多史实要么不写,要么写得隐晦。所以千年来有很多不解之谜。通过考证发现:赵匡胤是后周皇帝一手培养的,他的弟弟赵匡义的夫人与后周第二任皇帝的皇后是亲姐妹。过去很少有



人清楚这个史实。于是,依据考古,大胆揭秘。该书出版后,天津广播电视台对小说进行了连播。他们在连播的后期对我有个采访,问我想象的成分有多少。我举例说:我和一个朋友某年某月某日从淮阳出发,于某年某月某日到了天津,做了什么事,作为史料,会这样简单的记载。但路上我和朋友看到了什么,想了什么,说了什么,这是小说。但保证小说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是真的。

历史小说不仅要写出历史事件和人物,还要写出这个时代人们的饮食起居、风俗习惯、建筑等时代特征,这样才能把读者带入那个时代的情景中,才更真实感。如《秦楚情仇》中在描写王翳带兵攻楚的战马时,依据秦始皇兵马俑中战马的装束,特别写了战马的尾巴:为了防止交战时与对方的马尾纠缠,或者缠在战车的车把上,特别把马尾扎起来。在写项襄王安葬时,陪葬品则依据他的墓葬出土文物,如数如实描写。这样不仅具有真实感,也更具知识性。

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大的时代背景,也有小的生活环境,如果忽略了小的生活环境的书写,很容易给读者“飘”的感觉。人物形象和场景也难以立体化。《汲黯传》写到汲黯做东海郡太守时,因为笔者没有去过山东临沂一带,对那里的地理环境不熟悉,对那里汉代的风土人情一无所知,感到写不出那时“真实”的东海郡,所以,这一章不得不先搁置下来,直到全书写完,亲自到临沂一带考察了一圈,到博物馆和考古所通过文物了解汉代东海郡的方方面面,才写出这一章。

历史小说还有一个避不开的问题:引用历史人物的作品和诏书、祭文等,是原文引用还是使用翻译文本。通过反复掂量,为了凸显历史的真实性,对于这些,需要采用的,一律使用原文。因为有些古文用现代的词汇,很难准确表达出当时的语义。这样,可能会给读者带来阅读的不便,但会给读者真实的历史。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当我看到许多善男信女在佛像前礼香跪拜的一幕,或在各类文字中目光触及“禅”字的那一瞬,一连串问号便会如古刹钟声撞击心怀:何为佛,如何奉佛?何为禅,如何修禅?自是无解。

然而,众多人趋附之事,必有其因,定有其理。我还进而想到,佛道本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鲁迅先生曾高度肯定过宗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赵朴初先生则说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988年版)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以文学的视野进行探求,以文学的笔墨加以书写,无疑有着特定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便动念要写一部以佛禅为题材的小说,叙写佛法僧,探究儒释道。

小说的第一要素是人物。是写高僧大德,还是写普通僧尼,或是写信徒居士?此念一生,“佛印”的名号倏忽跃到眼前。佛印乃广为人知的宋代禅师,被称作“僧中尚书”。我的家乡距佛印出生、出家的景德镇浮梁县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使我了解佛印多了一些方便。过去曾读到过若干关于他的文字,我获得的大致印象是,这是个非同一般的和尚。但同时又觉得,文学江湖中的佛印形象影影绰绰,颇费思量。

于是,我便有了一个执念:佛印或许可以成为书写的对象。但当我开始搜寻资料时,又裹足兴叹了:佛家生活远离尘世,佛学经典高深莫测,佛教中禅宗本是艰深一曲,宋代社会又何等遥远……能够成篇、可以示人乎?经几番思索,我选择了“随缘”,先给足向前,作一番探究,做一番功课,再视情况决定进退。

我开始了佛印的寻访探求之旅。先是研读了搜罗到的涉及佛印的史志、谱牒、著述,又走进佛印故里的水田园、大街小巷,听许多人对佛印津津乐道,有与佛印同属林姓的乡民赠我《佛印》小册子,内面居然有一份佛印书法作品的影印件。接下来开始一一叩访佛印曾经学经传道的名刹古寺,拜访了多位高僧大德。在佛印受剃度的浮梁宝积禅寺,我听到了许多与佛印有关的故事,俯身探看了那口幽深而神奇的水井,因为有僧人告诉我,此井与佛印有关;在佛印升座的能仁禅寺(古称承天院),近望庐山,我细细看过了那奉为传奇的水滴石和石船铁人;在佛印曾四任方丈的云居山真如禅寺,我站在“石床”边,听方丈纯闻法师讲述苏轼与佛印在此论道的佳话,法师还为我书写“云居胜境”条幅;在镇江金山的江天禅寺,方丈捧出了珍藏的一个精美大圆盒,盒里盘着一根由24片玉石缀成的腰带,这便是传为苏东坡因斗机锋“输给”佛印的玉带;我也曾到更多的佛寺体验、求证,甚至在寺中且食且宿,专注地欣赏佛寺的朝晖夕照和高墙古木,聆听晨钟暮鼓和诵经之声,翻阅珍藏在藏经阁里的佛学经典和寺史山志……许多1000年前的人与事生动地跃现眼前,一个比较完整、真实的佛印形象呈现脑海,亦有真实丰富的佛教知识、鲜为人知的寺院生活融入胸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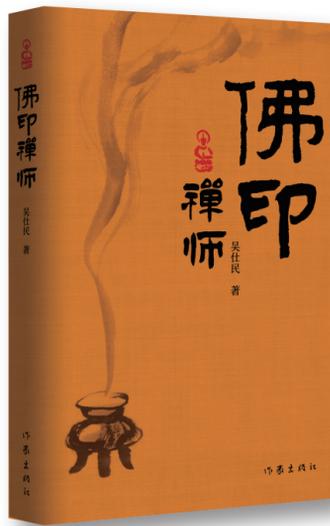
当铺纸运笔时,疑难又起,对书写佛禅这样一种非同一般的题材,当如何用心用笔?我想到了唐代诗人、画家刘商《酬问师》诗中的两句:“诗境何人到,禅心又过诗。”既然禅心有助于作诗,那也一定有益于为文,于是顿悟:但以禅心写禅事——虽然我并非佛教徒。

但何为禅?又何为禅心?千百年来,人们为文为言对“禅”字使用甚广,有禅心、禅风、禅意、禅味、禅茶等许许多多的词组,对“禅”和“禅心”的理解多种多样,可谓各持其识,各有其见:或明确而又玄奥,或真切而又朦胧,或美妙而又辽远。

在阅读、求问和积淀后,我对禅的认知是:禅虽带有玄妙,但并不神奇玄奥,“禅”的本义是禅宗的一种修持方式——静虑,由此派生、引申出许多与佛教相关相通物象;我理解的禅心则是指一种心境:静虑以求真,专注以求实,体悟以求妙。因而我努力将这些贯穿在整个创作过程之中。

但以禅心写禅事

——《佛印禅师》创作琐谈 □吴仕民



首先思虑的如何聚笔墨于佛印的特质,写出一个源自真实、形象鲜明的禅师形象。他身上有着中国僧人共有的秉赋,但又有其独特的个性:自小出家,阅历丰富,精研佛学而又贯通儒道,身在佛门而不隔绝人世,庄事佛而又机敏诙谐,坐禅诵经而又交游广泛。就修持而言,在家与出家虽然身处两境,但人性与佛性从不隔离,佛道本在人间,佛性本是人性。这些为佛印这个人物形象确定了基本色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宋僧人的特点。我的小说,不是为了还原佛印在禅林中“僧中尚书”的形象,更不是蹈对历史人物进行翻炒的窠臼。只是实实在在的去写一段历史,写一群人,着力塑造自有特点的艺术形象。

求真便当求实,以故事和细节去完成人物形象。在写作中,对历史不戏说,更不妄语。尽管在许多看来,佛禅充满神秘,认为僧人有超乎寻常的力量,谈及佛僧往往和法力无边、有求必应等相联系,但我只探求和体现佛禅之本义。以佛印形象而论,在一些碑史、文艺作品、民间传说中,多把佛印描绘成一个博学且机敏幽默的僧人加俗子形象,在谈及他与苏东坡的交往中,讲的则多属虽然有趣却失之粗俗的故事,甚至有“不秃不毒”这样的用语。有人称他是一个喝酒吃肉的“花和尚”(林语堂语),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把佛印的俗姓俗名也弄错了(抑或是有意为之?)。我尽可能透过斑驳的表面,去寻求蕴藏在其中的真实与精华,着力书写一个属于佛、属于僧、属于中国文化的佛印。涉及其人生轨迹、故事的历史背景、社会生活的描摹展示,尽可能有所据;涉及的诗词文赋亦是尊重史实,多有所本。当然,小说又毕竟是文学,不可能抛开文学的规范与特质。我笔下的轨迹是:以历史为筋骨,以文学为血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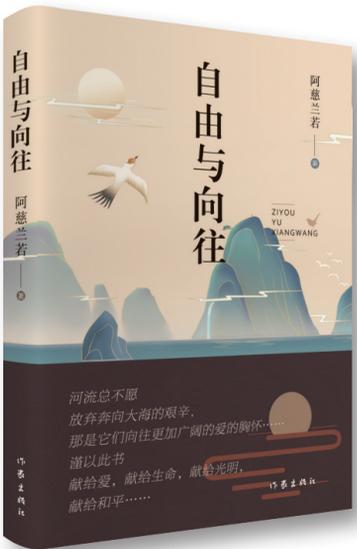
创作与修禅有相通之处,静而后能定,定而后能思,思而后能悟,悟而后能妙。文艺创作不会是镜子般地还原生活图景,会有作者对生活的主观体悟,对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独特评判。小说的创作过程,也是作者体悟的过程,是对书写的题材、描绘的人物以及作品主题不断思索的过程。我努力去体悟佛的真谛、禅的精义,并试着渗透到小说的人物之中。其中有一个重要体悟是:奉佛修禅最重要的不是“求”(如求福求寿、求子求财),也不是“舍”(如扶危济困、救苦救难),而是“觉”和“悟”,洞察世界,参悟人生,觉悟自身,用一句禅师的话说便是:“禅修的最高境界是求得内心的清净。除此以外,别无所求。”当然,体悟不止此一端,更多的体悟已融注在作品之中,至于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不用赘述,高明的读者自有判断。

回首方知山势险。写佛写禅实在是一个极不易做好的功课。书成初稿之后,得到了中国佛教协会有关同志和几位名寺住持的指点,责编宋辰辰女士为此书倾注了无数心血。这些亦是此书能够送到读者面前的种种机缘。

爱与希望的清韵和旋律

——从读者的眼光看《自由与向往》

□阿慈兰若



落地生根的充满本真的语言和描写,净洁得有些超然,既有古典美的人文心理,又有现代美的活泼灵动,从中看出散文的崭新魅力。

这本书独特的标识,饱满的文字张力,细致的情感,字里行间无处不在的静美禅意,让人时刻体悟到文字之外的清韵和旋律。

这种将精神高蹈的哲思融入平常生活的细微,将自然的变化点滴融入生命脉动的节奏,都让读这些作品的人清晰感受到作家洞悉对生命平等挚爱真谛的用心。

你的文章华赡而不失朴拙,意境庄严而不失活泼,别具美感,独具个性。

书中所用笔法既清新隽永,又典雅华丽,且自由奔放,又禅意自然,朴实而耐读,意蕴深刻随处是妙悟的境界。

无论创作方法、风格、思想、艺术表现技巧,都明显与众不同,深刻而超然,读来耳目一新。

书中所收篇章,每一篇都是与生命本真的对话,风格清幽,博雅大气,绵远智性与诗性完美结合,自然与文化巧妙交融,将生命的密码,用温润的爱与美的画卷展示出来。意境优美,平中见奇,奇而妙悟,小中见大,大而通幽,哲理丰富,自

由和平,处处是丰腴而富于想象的金色花朵般绽放的哲言警句,处处是引人入胜的美好境界,充满温暖、祥瑞,满满的正能量的光芒,让所有的凄迷和忧郁无处藏身。这无疑对人生和生活有着光明的启迪,思想的博大精深,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或是形式与内容上都提供了一种独有特征的尝试和探索,从中可以看出作家深厚的生活与人生经验,以及文学功底。

说事说理,亦庄亦谐,深入浅出,佳趣十足。这部书让散文形态的丰富有更广阔的可能,由此,我更期待你即将收官的《寂静的太湖》早日与读者见面……

我不同意这些看法,当我作为一个读者,数十遍地品读这部书中的每一个文字,每一句话时,我竟然发现自己还是比较赞同他们的这些恰当与不恰当的说法的。我知道,我们说了不算,只好任凭水平高超和火眼金睛的读者朋友们评说了。

当然,重要的是这本书告诉人们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尘世之中,因为智慧而不被世繁困扰,自在遵从心灵愿意去生活的人生,灵魂是自由的,它对事物纯粹的爱与和谐无间,让世界变得美好

了很多,再加上河流奔向大海的那种坚韧与永不放弃,如此有向往精进不息的追求生活的美好自由精神,再大的困难都不是困难,再多的烦恼都不是烦恼。

我对生命、生活、人生、环境的敬畏和礼赞,同时也是对自由与希望的敬畏和礼赞。

正如我在书中所说:当生活的迷雾遮蔽了我们的双眼,当生活的泥潭吞没了我们的双脚,让我们举步维艰,不能自拔,当我们四顾无缘,现实已不得不让我们放弃希望和追求,那也要如一泓溪流,拼尽最后一丝气力继续往前,至少我们希望的前方,还有大海的潮汐在呼唤。

我也坚信我的这种人生态度、生活态度,这种锲而不舍追求光明与真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希望与明天永不放弃的正能量精神,定会让人在迷顿困苦之时看到生命的光芒,希望就在前方。

只要不放弃,锐意进取,就一定有希望和生机的光焰燃起。这些话无疑是文学最可贵的语言和力量,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文学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但愿这部书将是奉献给读者朋友们的一道别有韵味的精神盛宴。

(摘自《自由与向往》,阿慈兰若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